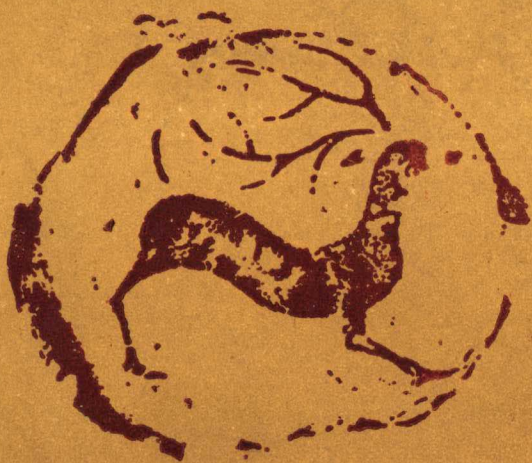


桓譚及其新论



桓 谭 及 其 新 论

■宿 县 桓谭新论校注小组
■安徽大学中文系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新论选注.....	(13)
新论校点.....	(79)
桓谭其它作品.....	(157)
前人误收桓谭作品考.....	(159)
桓谭本传.....	(161)
附：有关《新论》的考证和评论.....	(181)
后记.....	(191)

前 言

东汉初年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他的《论衡》中，多次称道两汉之际的桓谭及其代表作《新论》。在王充看来，在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中，“君山为甲”。他指出：君山“作新论，论世间事，辩昭然否，虚妄之言，伪饰之辞，莫不证定。”（《论衡·超奇篇》）

那末，桓谭具有哪些进步思想，他在《新论》中又提出了哪些兴治国家的主张，以至于受到王充的如此推崇呢？

（一）

桓谭（公元前23年？——公元56年），字君山，沛国相（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）人，是两汉之际的一位力主兴治国家，反对腐败政治，首创形毁神灭论，批判谶纬神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。

桓谭所处的时代，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，“天下不时安定”，社会陷于混乱，谶纬神学泛滥成灾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。

西汉自元帝起，政治日趋腐败，大地主、大商贾、大官僚纠合在一起，把持着朝政，他们使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，肆意兼并土地，掠取奴婢，致使广大农民甚至中小地主日益破产。据《汉书·薛宣传》记载：成帝时，丧失土地的农民“流离道路，疾病死者以万数，人至相食”。有的沦为奴婢，被当成商品拉到街上出卖，“与牛马同栏”。生产萧条，民不聊生。

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，使广大劳动人民极为不满，纷纷起义。成帝、哀帝在位期间，关中、颍川、广汉、山阳、关东等地的农民及手工业者疾呼而起，猛烈地摇撼着西汉王朝的大厦。

那些把持朝政、代表地主阶级腐败势力的豪强、商贾，并不因为西汉王朝岌岌可危而停止倒行逆施。他们一方面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，另一方面对统治集团内部实行高压政策，任人为亲，排斥异己。打着变法旗号，干着复辟勾当的野心家王莽，他就利用篡夺的权力把汉朝的老官吏都集中到京城，名曰等候统一安排，实则废置不用，另外组织起自己的一套人马，搞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，人人自危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。

他们除了使用暴力手段外，同时加强了欺骗和麻醉的宣传。为自己不得人心的统治寻求助力，因此一种专门诡称天命的谶纬神学便盛行起来。汉哀帝假借天意玩弄起“二次受命”的把戏，王莽托称天命，演出一幕幕逼宫丑剧；刘秀重蹈复辙，大建灵台，宣布图谶于天下。

然而，谶纬神学这副麻醉剂，不但不能缓和阶级矛盾，反而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。达官贵人在“富贵天赐”的幌子下，更加贪婪凶残；下层官吏在“听天由命”的说教声中，醉生梦死，不恤国事。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，而统治集团愈来愈昏昧。

桓谭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动乱社会中度过的。衰而思兴，乱极思治。桓谭这个有远见有抱负的地主阶级政治家，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用于“兴治”的事业上。他博览群书，认真总结古往今来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，极力探索“兴治”之道。他所著的《新论》，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写成的。他提出要澄清被谶纬神学搅乱了的思想，纠正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，刹住兼并

之风，恢复奖惩制度。他说：“举网以纲，千目皆张；振裘持领，万毛自整。治大国者，亦当如此”。这种治国抓纲的兴治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

桓谭身体力行，勇于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他“非毁俗儒”，拒交权豪，指摘时弊，不合污流，因而受到大地主、大官僚的排挤，“哀、平间，位不过郎。”当野心家王莽夺取刘家政权之时，群儒“莫不褒称德美，作符命以求容媚”。而桓谭不随波逐流，他清醒地看到王莽所推行的是一条“事事效古”的复古倒退路线，必然要“破亡”。因此，以推翻王莽为目标的农民起义爆发后，桓谭便投身于新市、平林农民起义军，并当了起义军拥立的更始政权的太中大夫。

光武帝刘秀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进行统一战争，建立东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以后，桓谭便把“兴治”的希望寄托在刘秀的身上。由于大司空宋弘的推荐，桓谭当上了议郎给事中，直接参与朝政。在他任议郎给事中期间，曾两次上疏给光武帝。第一次上《陈时政疏》，比较全面地陈述了自己的兴治主张。但由于刘秀终究是地主豪强势力的总代表，因而不予以理会，却一头钻进“讖记”、“纬书”里，“多以决定嫌疑”。桓谭面对当时“天下不时安定”的混乱局面，心急如焚，便又“冒死复陈”，上《抑讖重赏疏》，一针见血地指责刘秀“听纳讖记，又何误也”。这第二次上疏，使刘秀很不高兴。中元元年（公元56年），刘秀大会群臣，要用讖来决定建筑灵台的地址，并有意以此征求桓谭的意见。桓谭明知处境有危险，却不迎合光武帝，在“默然良久”之后，仍坚定地回答说“臣不读讖”，表示反对。刘秀问其原因时，他又“极言讖之非经”。桓谭的这种态度，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无畏精神。光武帝对此恼羞成怒，给桓谭加了个“非圣无法”的罪名，几

乎要杀掉他。在被逐出京城贬为六安郡丞后，桓谭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忧愤不乐，终于病死在赴六安的途中。

桓谭的一生，是反对地主阶级内部腐朽势力的一生，是扫荡谗纬妖雾的一生。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，他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。他写的《新论》等著作，可惜早已失传。现在所能见到的《新论》，是从各种古籍中辑集而成的。虽说不很完整，但从中能基本上看出桓谭的思想概貌，是我们研究桓谭，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重要资料。

(二)

《新论》一开篇，桓谭就说明了写这部书的目的在于“兴治”。这是针对当时大地主、大商贾、大官僚三位一体的豪强势力控制朝政，“天下不时安定”的危险局面而提出来的。他在上给光武帝的《陈时政疏》中也指出，政不合时，应该“解而更张”，改弦易辙。

桓谭认为，要“兴治”就必须抓住“纲领”。什么是治国的纲领？桓谭在《新论·王霸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唯王霸二盛之义，以定古今之理焉。夫王道之治，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，然后教以礼义，使知好恶去就，是故大化四溟，天下安乐。此王者之术。霸功之大者，尊君卑臣，权统由一，政不二门，赏罚必信，法令著明，百官修理，威令必行。此霸者之术。王道纯粹，其德如彼；霸道驳杂，其功如此。俱有天下，而君万民，垂统子孙，其实一也。”这就是桓谭所倡导的“霸王道杂之”的兴治纲领。桓谭把王道解释为“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，然后教以礼义，”这和孔丘鼓吹的“去食”、“去兵”，而空唱仁义高调的王道就有了本质的区别。桓谭就是这样把王道和霸道

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。

“霸王道杂之”，是汉宣帝对西汉前期、中期汉家制度的高度概括。桓谭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热情地赞扬了汉高祖、汉文帝、汉武帝、汉宣帝能够推行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汉家制度，因此国家就兴盛，形势就稳定，生产就发展。汉元帝以后，尊王贱霸，重用庸材腐儒、谄媚小人，逐渐背离了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汉家制度，使国家“退致废乱”。桓谭在进行正反比较后，明确向光武帝建议，必须“申明旧令”，恢复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汉家制度。

治乱以霸是桓谭强调的重点。他严厉地驳斥了俗儒攻击霸道“违仁义而尚权诈”的谬论，大声疾呼，只有统一法度，强化地主阶级专政，才能使“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”。这儿所说的“躁人”，主要指的是豪强势力。他揭露了那些豪强不服从法令，“私结怨仇”，以至于使中、小地主和自耕农倾家荡产的严重事实，要求“申明旧令”，严格法禁。他还列举了当时存在的“法令决事，轻重不齐”、“一事殊法，同罪异论”，因而造成营私舞弊、贪赃枉法的恶劣现象。桓谭揭露那些贪官污吏们“午文成恶”，为所欲为，“欲活则出生议”，“欲陷则以死比”，有罪可以判成无罪，无罪可以判成死罪。“至于言语小故，陷致人于族灭”，搞得人人恐惧，社会混乱。桓谭痛心疾首，感慨万千地说，就是让通晓法律的皋陶来审定，也没有办法啊。因而他坚决主张“蠲（音捐，免除）除故条”，“一其法度”，即废除那一套不合时宜的条令，而代之以统一的适时的法制。他还建议选派一些通晓法律的人重新校定法令条文，颁布各郡，使全国都知道。

当然，强化地主阶级专政在当时来说是治乱的需要，对稳定形势、发展生产，具有一定的作用。但专政是阶级的专政，

镇压“躁人”就不会不包括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。我们不能忘记其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。

桓谭的反兼并经济主张，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西汉以后，经济上的主要社会弊病是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。因此，反对土地兼并是桓谭兴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。由于《新论》散失不全，我们无法从中看到桓谭对这个问题的全面阐述。但是，从他后来上给光武帝的《陈时政疏》中，仍能大略看出他有关这方面的思想。

桓谭正确地指出：“举本业而抑末利”是“理国之道。”这是就当时土地兼并而带来的农业生产萎缩，封建经济出现危机的现象提出来的，并不是先秦法家那种“重农抑商”政策的简单的重复。先秦时期，大商人是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，他们的活动对封建经济的兴起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。所以，先秦法家无不主张抑商，从经济上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。随着封建经济的巩固，商业也需要随之发展。因而，桓谭的“举本抑末”包含着反对兼并的新内容。

桓谭不仅明确主张“抑并兼”，还提出了反兼并的具体措施。他建议：“禁人二业，锢商贾不得宦为吏”。就是说，禁止兼营农商，不准商人做官。这是一项针对性极强的重要措施，矛头所向直指大地主、大官僚、大商人三者合一的兼并势力。西汉末年，地主阶级的庄园经济已经开始形成，地主、官僚、商人逐渐合流，很多人是一身兼三任。他们凭着金钱和权势，肆意掠夺土地，役使农民。这是一股最危险的豪强势力。抑制兼并，首先就是要限制和打击这股势力，从经济上削弱他们的力量。

桓谭还抨击富商大贾“多放钱货”，“不耕而食”，“多通侈靡，以淫耳目”，建议“令诸商贾自相纠告”，没收那些

并非自身劳动所得的财货，用来奖赏告发的人，使他们不敢再放高利贷，而“归功田亩”。可见，桓谭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并非一概排斥商业，而是要取缔那些对封建经济发展起破坏作用的高利贷剥削。

要真正抓住“兴治”国家的纲领，实现“霸王杂之”和抑制兼并的主张，没有一批有才干的人物在台上是不行的。所谓“王者易辅，霸者难佐”（《求辅》），确是桓谭的切身体验和深刻感受。因此，他在《新论·求辅》篇里，集中地申述了“任人唯贤”的主张。

桓谭一生经历的几代皇帝，无不是“任其私爱”，推行一条“任人唯亲”的路线。桓谭对此十分不满。他历数了压抑排斥贤才的种种弊端，并愤怒地指出：“伊吕良平，何世无之？但人君不知，群臣勿用也。”他还引用了《战国策》上的一个故事：魏牟指责赵王制冠“不使亲近而求良工”，而治国却“不求良工而任其私爱”，岂不是把一个国家看得还不如一顶帽子重要吗？这个浅显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。为了“兴治”国家，他主张慎重选择“辅佐”。他把刘邦和王莽作对比，认为刘邦是“知大体者”，由于重用萧何、曹参等一批谋臣良将，因而取得了天下；而王莽“嘉慕前圣之治，而简薄汉家法令”，是“不知大体者”，只任用“世姓及信谨文吏”或者“亲属子孙素所爱好”（《言体》）因而败亡。两条用人路线，两种不同结果，清楚地说明了“任人唯贤”的重要性。

光武帝上台后，仍然重用世家贵族，朝政仍被豪强地主把持。桓谭迫切要求改变这个局面。他在上疏中提醒光武帝：“政事得失，由乎辅佐”。并指出：辅佐贤明，治理国家的措施就能符合社会实际；辅佐不明，治国主张就不适合时代的需要，所采取的措施也都违背实际情况。所以，选择的“辅佐”

是否贤明，关系到政事的“得失”乃至国家的兴亡。这是桓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，对历代政治家治国经验的总结。

桓谭认为，“政道未理者”，是因为“贤者异也”。那末，他要选的是什么样的“贤者”呢？他在《新论》中，不仅提出要以“才高卓绝，疏殊于众，多筹大略，能图世建功”为最高的选贤标准，而且还举出了一大批西汉初期和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作为榜样。他称赞张良、萧何的“制事定法”，晁错的“高节”轻死，周亚夫的雷厉风行，汲黯的“敢于谏争”。他认为，只有重用这样一批具有雄才大略的“贤者”，才能真正使国家形成乱而复治衰而复兴的兴盛局面。

(三)

在两汉之际完成的《新论》，不仅说明了桓谭是一个有远见的地主阶级政治家，而且表明他是一个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。

混乱的社会必然带来混乱的思想。那种专门伪称天命的谶纬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。由于西汉哀帝、平帝的提倡，加上新朝王莽、东汉刘秀的大力宣扬，以谶纬迷信为主的神秘主义思潮当时笼罩全国。

桓谭正是在这谶纬盛行之时，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著名命题的。在《新论·祛蔽》篇中，他用烛干比喻人的形体，用烛火比喻人的精神，“精神居形体，犹火之燃烛”。精神的强弱决定于形体的强弱，如同火光的强弱决定于烛干的长短和油脂的多少；烛干烧尽，烛火无法复燃，人体衰亡，精神也随之消失；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，就好比“烛无，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”一样。桓谭还进而以烛火比喻来说明人老如秃。

灯，人死如灯灭；并把人的生死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同“草木五谷”“禽兽昆虫”一样，“生之有长，长之有老，老之有死，若四时之代谢”，人的主观愿望是无法改变这个规律的。

桓谭用烛火比喻人的形体和精神的关系，理解人的生命问题，表明他已经认识到物质（形体）是第一性，精神是第二性的，精神是物质的产物。这种形在神存，形毁神灭的理论，是批判谶纬神学的有力的思想武器。

桓谭站在这个思想高度，看清了当时官方所宣扬的谶纬迷信的虚伪、荒诞，及其引起的思想混乱，为了扫清兴治国家的思想障碍，他毅然举起反谶纬迷信的大旗。所谓“谶”是一种“诡为隐语，预决吉凶”的宗教性的预言，它假托神的启示进行欺骗宣传；所谓“纬”，是用天象变化来附会人事，并用宗教迷信观点来解释儒家经典，使经学神学化。所以，谶纬学是一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唯心主义学说。桓谭在《启寤》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谶记、纬书不过是“后人妄复加增依托，称是孔丘，误之甚也。”他认为，圣王治国，应“以尊贤爱民为务”（《言体》），因而很少用占卜、祭祀。因此，他极力反对皇帝迷信谶纬、大搞卜筮祭祀以求天福的愚蠢行为。

桓谭对王莽笃信谶纬和鬼神给以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。王莽“好卜筮，信时日，而笃于事鬼神。多作庙兆，洁斋祭祀，牺牲滂膳之费，吏卒办治之苦，不可称道。”尽管他是那么虔诚，但由于“为政不善”，倒行逆施，以致“见叛天下”，引起了全国农民大起义。他仍执迷不悟，“乃驰之南郊告祷，叩头请命，幸天哀助”。当起义军打入皇宫，“射矢交集，烽火大起”之时，王莽“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（形象北斗，是王莽用来镇妖压邪的）”。结果老天爷并没能挽救他的失败，终究落个国破人亡的下场。桓谭最后指出，王莽这样

做可说是糊涂到极点了。从而有力地戳穿了“天人感应”的谎言和谶纬的骗人把戏。

当刘秀不能记取这个历史教训，也十分崇信并大力宣扬谶纬迷信时，桓谭便在上疏中揭露谶纬是“奇怪虚诞之事”，根本不可相信。他说：所谓“天道性命”，连“圣人”孔丘自己也说不清楚，“况后世浅儒，能通之乎？”他建议光武帝采取措施，“屏（弃）群小之曲说，略（去）雷同之俗语”，即排除儒家之徒和方士们捏造的谶纬邪说，并对那些“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”的浅儒应该“抑（而）远之”，以免他们“欺惑贪邪，诖（音卦，牵连）误人主”。桓谭到晚年还冒着杀身之祸，“极言谶之非经”，同光武帝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。桓谭这种为真理而敢于献身的精神，在当时是极其可贵的。

由于封建统治者伪造天命，崇信谶纬，借此巩固统治，愚弄人民，所以，在两汉之际的社会上，尤其是在统治集团当中，各种迷信大量流行。或炼丹烧汞，寻长生不死之药；或问仙访道，求延年益寿之方。曲阳侯王根把方士请到家里，为学得长生之术，黄门郎程伟将妻子活活逼死，为索取炼丹之法。真是阴风四起，妖雾迷漫。桓谭以朴素唯物论思想为武器，反击了这股儒学妖风。他在《新论·辨惑》篇中明确指出：“无仙道，好奇者为之”。断然否定了仙道的存在。桓谭曾同鼓吹人可以“长生不死”的方士西门君惠面对面地进行论战。西门君惠胡说什么龟能活三千岁，鹤能活一千年，人难道不如虫鸟吗？桓谭以讥讽的口吻驳斥道：“谁长久地与龟鹤住在一起，而知道它们活的年岁呢！”这位方士被驳得膛目结舌。桓谭的好友刘子骏受了方士的欺骗，以为人只要“闭目寡欲”，就可以长寿。桓谭指着庭前一棵衰老的大榆树反驳说：“这棵树没有耳目情欲，仍免不了枯槁；人即使修身养性，又怎么能长生

不老呢？”

桓谭同谶纬迷信等儒学妖风进行了长期的斗争。他的闪耀着唯物论光辉的“形神论”便是这种斗争的思想结晶。这种“形神论”的思想，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，而且对后来的王充、范缜等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有着重大的影响。

桓谭之所以能够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，对谶纬迷信给以有力的批判，不仅因为他继承了前人的进步思想遗产，而且与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有关系。桓谭很注意研究当时新的科学技术。他精通天文学，主张“浑天说”，反对儒家的“盖天说”。他对医学、水利建设、农具改革等方面都很关心。所有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，对桓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，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恩格斯说过：“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，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，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，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。”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，第343——344页）桓谭作为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，在西汉末至东汉初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，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，起而批判谶纬迷信，提出一系列兴治主张，不愧是一位反谶纬迷信的先驱。

但是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，又处在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趋保守的时代，他的思想不能不受那个阶级和那个时代的局限。在《新论》中，有些篇章是精华与糟粕互见，正确与错误并存。他主张统一和进步，却否定秦始皇废分封、立郡县的革命措施；他肯定法治霸道的进步作用，却把所谓“暴秦”和王莽的残暴统治相提并论；他抨击儒家思想，但又承认孔丘是“千载一出”的“圣人”；他批判“天人感应”论，但又认为只要君主“修德善政”就可以使自然灾害消亡。至于在形

神关系上，他也不了解精神是社会实践的产物，那更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。

历史的发展证明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、最革命的阶级，它不但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，而且要根本改变一切传统的观念。因此，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历史使命，已落在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肩上。我们必须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研究和总结历史阶级斗争的经验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《新论》选注

